

民族教育理论与实践探索

민족교육에 관한 리론실천적탐구

韩英烈

MNZJGUYULIUNYUSHIANTANSUO



延边教育出版社

PDF

序

首先，对韩英烈同志所著这本文集的问世，并将要与读者见面，表示我诚挚的祝贺。这是因为：第一，我与他交往、共事差不多快二十年，我是了解他的为人。我们是好朋友，对他所取得的成就表示祝贺，理所当然。这是朋友间情谊之所为，人人会有之。第二，新中国成立已过五十个春秋。但是，就我所知，在这五十年里朝鲜族教育工作者中编辑出版文集的竟是如此之少而又少，真可谓凤毛麟角，所以，韩英烈同志这本文集的出版，不能不令人感到珍贵，当然也使人感到高兴。我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自然是由喜而致贺。第三，我对文集的每篇文章，尽管未能从头到尾仔细阅读，而只是粗略地看了一下，但是，感到这些文章所探讨的内容和采取的方法，会给有意于研究教育现实问题的人，提供一些有益的启迪，起到交流经验的作用。

韩英烈同志从事教育工作几十年，曾较长时间担任过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职务，后又奉命调任吉林省教育委员会副主任至今。他是一位有成就、有经验的老教育工作者，尤其为朝鲜族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尽了作为朝鲜族教育工作者的责任。这些都是当之无愧的。这本文集的出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文集所收录的 30 多篇文章，其写作时间自 1977 年至 1999 年，年代跨度达二十多年。这正是随着整个国家的改革开放，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步伐不断加速并取得成就的年代。这些文章恰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特征。这些文章，有的是在一些

会议上的讲话,有的是为党政领导部门起草的文件、报告,还有一部分是曾在报刊上发表过的研究论文,而且涉及到多方面的内容。文章的风格也有所不同。但是,从这些文章中不难体会到,他重视实践,脚踏实地,肯于钻研、勇于探索的精神和作风。

按照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经验和理论都是实践的产物,是主观对客观的反映。而反映得正确与否,还要经过实践的检验。在这本文集中所提出并探讨和论述的问题,都是来自于实践,即来自于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实践,是在实际工作中碰到的各类问题和矛盾。而对待这些问题,不是简单的就事论事,而是经过认真分析、比较、研究,概括为经验,升华为理论,然后用以指导实践、指导实际工作。这就是说,探讨教育改革和发展遇到的各种实际问题,其目的和出发点,并不是为研究而研究,而是在正确认识的基础上,有助于实际问题的解决,以推动事业的发展。从实践中来,又回到实践中去,对待教育问题研究的这种科学态度和方法,是值得我们学习和提倡的。

原国家教委民族教育司司长 朴胜一
2000年4月12日于北京

前 言

少数民族教育是我国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地方民族教育得到了快速健康发展。认真研究和总结地方民族教育特点、规律、经验及发展历程，对于当前民族教育改革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民族教育理论与实践探索》的出版，不仅为民族教育的理论研究提供了有益借鉴，而且在探讨民族教育行政管理方面填补了一项空白。这本书辑集了韩英烈同志二十多年来关于民族教育的主要论述，也是韩英烈同志关于教育理论与实践的一本自选文集。

作为长期分管民族教育工作的吉林省教育委员会副主任韩英烈同志从事教育行政工作几十年，曾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教育行政部门担任过主要领导职务。韩英烈同志对宣传、发展和推进民族教育不遗余力，为民族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民族教育理论与实践探索》是从韩英烈同志在1977年至1999年间所起草的文章、报告、讲话中所收录的，全书共收入30多篇文章。这本文集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从民族教育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宏观到微观、理论探索和实践经验等，多侧面、多角度、历史地、全方位地记载和反映了地方民族教育的发展历程、宝贵经验和理性思考，具有纪实性强、理论见地高、时代特征鲜明、民族特色突出、占有资料丰富的特点，对党政机关政策研究部门、教育行政部门、教育科研部门和广大中小学教师无疑会有重要的学习和参考价值。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韩英烈同志为发展民族教育苦苦研究探索奋斗了大半生，从《民族教育理论与实践探索》一书的字里行间，我们不仅看到一位老教育工作者对民族教育的深刻见地与理性把握，而且还可以看到一个毕生献身于教育的工作者对事业的一往情深。我们相信，这本书必将成为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良师益友。

吉林省教育厅民教处处长 黄宗植
延边州教育委员会主任 李 勇

— ● 目 录 ● —

序.....	韩胜一(1)
前言.....	黄宗植 李 勇(1)
清算谬论邪说,振兴民族教育	(1)
汉语教学与民族教育.....	(9)
汉语教学法初论	(13)
关于编拟朝鲜语文课《双基纲要》问题	(25)
如何做一个合格的人民教师	(32)
借鉴“发展教学”浅议	(46)
汉语教学法再论	(56)
关于延边州汉族教育情况的报告	(64)
민족교육의 질적수준을 높이기 위하여 분투하자	(76)
要重视生物实验室建设	(83)
朝文教材改革必须抓紧抓好	(91)
民族教育管理的若干理论问题	(97)
关于民族学校“三语”教育改革的设想.....	(111)
浅谈蒙语文教学及其诗歌朗诵.....	(119)
搞清学习心理学的“三个关系”,根治教学工作 中的“三个弊病”.....	(121)
论德育研究.....	(126)
坚持民族高等艺术教育的正确办学方向.....	(139)
要把握住农村职业技术教育的方向.....	(144)
关于我国农村职业教育课程教材的实用性问题.....	(150)

论我省农村职业教育发展对策	(155)
必须加强朝鲜民族教育科研	(165)
民族教育改革要点	(173)
关于民族教育工作的若干问题	(174)
韩国普教引进职教因素从小学到高中由浅入深	(181)
韩国职业高中课程设置评介	(185)
연변과학기술대학 제1기 개학식에서의 축사	(193)
为延边州争创“双一流”教育进言	(199)
浅谈美育	(206)
向延边大学“211”工程领导小组进言	(209)
吁请重视职业教育的发展与改革	(213)
简论中外合作办学	(220)
谈对外汉语教学的有关问题	(227)
认真开展民族常识教育活动	(229)
对民族语文“十佳”教师的三点希望	(237)
关于民族教育专项补助经费及其分配使用问题	(242)
在吉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成立大会上的致辞	(245)
认真学习贯彻《高等教育法》力争把延边大学 办成全国一流的民族高校	(247)
后记	(254)

清算谬论邪说 振兴民族教育

(1977年8月)

全国人大五届一次会议发出了“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为把祖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伟大号召，这是搞好我国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为了使广大少数民族人民群众在把祖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实践中多做贡献，就必须振兴民族教育，极大地提高广大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水平。而要振兴民族教育，目前的关键在于深入揭批“四人帮”及其死党东北太上皇以及省、州委前主要负责人破坏毛主席民族政策的罪行，彻底清算他们的种种谬论邪说，把被他们搞乱的路线是非、政策是非和理论是非纠正过来。

—

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在民族问题上大作文章，挖空心思地制造了种种反动谬论。其中最阴险的一条，就是否认社会主义时期有民族问题。他们大肆鼓噪“民族问题不存在了”，“社会主义了，还有什么民族不民族”，进而恶毒攻击我们党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人为地制造分裂”。“四人帮”的这些谬论邪说，也就从根本上宣布了民族教育的死刑，致使广大民族教育工作者“看前途没奔头，干工作没劲头”，极大地挫伤了他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从而把少数民族的文化教育事业推到了濒于毁灭的边缘。

民族教育，究竟在社会主义时期是短命的还是长命的，是要加以取消还是需要扶持发展？这是近些年来许多人十分关注的重大是非问题。为了澄清被“四人帮”搞乱的这一重大是非问题，我们首先必须充分认识民族问题的长期性。革命导师列宁早就指出各个民族之间的差别“就在全世界无产阶级专政实现以后，也还要保留一个很长很长的时期”（详见《列宁全集》第31卷第73页）。这就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社会尽管能够消灭民族压迫，实现民族平等，但是不可能最终消灭民族差别，实现民族融合。正是因为如此，斯大林在批判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倾向时，尖锐地指出：“既然民族差别即民族语言、文化、生活习惯等等还存在，那末目前的历史时期取消民族共和国和民族区的要求就是一种违反无产阶级专政利益的反动要求”，“这就使苏联各族千百万人民群众不可能使用本族语言受教育，使他们不可能有使用本族语言的学校、法院、行政机关、社会组织以及其他组织和机关，使他们不可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以上引文，详见《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317页）显而易见，“四人帮”否认社会主义时期有民族问题，反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妄图用强迫的办法来实现“民族融合”，这是他们破坏民族团结、挑拨民族关系、制造民族分裂的鬼把戏。

民族问题的长期性，也就决定了民族教育的长期性。毫无疑问，搞好民族教育，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远之策。当然，民族问题同其它社会现象一样，也是随着时间、地点和条件的推移而变化、发展的。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和由此而来的民族教育的长期性，不应该也不可能成为固守民族狭隘性和保守性的依据。因此，我们的广大民族教育工作者必须坚持“教育要革命”的正确方向。固然如此，但是在民族教育改革中，应切忌被“四人帮”的极“左”而煽起的那种“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

放在现时来做”的左翼空谈主义。列宁说得好：“文化任务不能像政治任务和军事任务一样解决得那样迅速”，“这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因此，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在实现包括民族教育在内的少数民族文化革命任务的过程中，适应这个“较长的时期”来规划我们的工作，是尤其重要和必需的。

二

“四人帮”及其同伙疯狂地践踏党的民族政策，无视和抹杀民族特点，胡说什么“民族政策早已过时”，“再提民族特点就要犯错误”，从而严重地搞乱了人们的思想，致使不少人至今对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心怀余悸。于是，在我州民族教育方面存在有一个重大是非问题，即尊重还是抹杀民族教育的特点。

为了澄清这个是非问题，我们就要正确认识民族问题的特殊性。毛主席指出：“少数民族问题，它有共同性，也有特殊性。”然而，“四人帮”则形而上学猖獗，别有用心地用民族问题的共同性排斥、代替民族问题的特殊性，这是对马列主义民族学说的歪曲和篡改。固然，必须承认民族问题的共同性，不可否认阶级斗争的共同规律。正如列宁所说：“在任何真正严肃而重大的政治问题发生时，集团都是按阶级而不是按民族划分的。”但是，马列主义民族学说并不因此就否认民族问题的特殊性。这是因为各个民族的不同特点，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由于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的不同而形成的，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民族问题的共同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只有承认民族问题的共同性，才能使民族问题的提出和解决服从于无产阶级的总路线和总任务；也只有充分重视民族问题的特殊性，才能把阶级斗争的共同规律更好地运用于民族问题的解决。共同性与特殊性之两者关系的辩证法告诉我们，民族特

点绝不可忽视。谁不承认民族特点，谁就把党的民族政策一笔勾销；谁不注意民族特点，谁就不能真正解决好民族问题。

毛主席和党中央历来十分尊重民族特点，非常关心民族教育。毛主席早就指出：“尊重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宗教、习惯，不但不应强迫他们学汉文汉语，而且应赞助他们发展各族自己语言文字的文化教育。”为了发展民族教育，早在 1952 年政务院作出了关于建立民族教育行政机构的决定，并要求各级民族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处理“关于少数民族教育在行政、经费、师资、学制、课程、教材等特殊问题”。可是，这些年来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民族教育的这些特殊问题严重被忽视，出现了民族教育行政无人过问、民族教育师资后继无人、民族文版教材供不应求等等诸如此类的特殊困难。打倒了“四人帮”，民族教育得解放。为了极大地提高广大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的科学水平，以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我们要深入批判“四人帮”及其同伙抹杀民族特点的反动谬论，认真研究解决民族教育工作中存在的特殊困难和问题，尽快地把民族教育搞上去。

三

使用和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是党的民族政策的一项主要内容，也是民族教育所担负的一个重要任务。“四人帮”及其死党东北太上皇胡说少数民族语文“无用”，使用和发展少数民族语文是“倒退”，别有用心地散布“朝鲜族文字的命运顶多还用十年”，致使我州民族教育深受其害。其结果，在我州民族学校里，民族语文被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或者课时被大大减少，或者课程干脆被砍掉，更有甚者，教学用语被强行改用汉语，以致造成大量出现民族语文文盲、教学质量全面下降的严重恶果。揭批“四人帮”以来，这种状况虽然有了一些好转，但是现在仍需做好

分是非、肃流毒、消余悸的工作。

马列主义民族学说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不是民族文化瓦解和消灭的时期，而是社会主义内容和民族形式之民族文化的繁荣时期。斯大林根据列宁关于民族文化问题的提法的辩证性，明确指出：“在一个国家内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繁荣民族文化（和语言）是为了给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胜利时期各民族的文化（和语言）消亡并融合成一种共同的社会主义文化（和一种共同的语言）准备条件。”（详见《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320页）。正是因为如此，毛主席也强调指出，应赞助少数民族发展用各族自己言语文字的文化教育。马克思主义民族学说之所以如此重视民族语文的使用和发展，是“因为千百万人民群众只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才能在文化、政治和经济方面获得巨大的进步”（斯大林语）。由此可见，“四人帮”妄图用“落后、倒退”之类吓人的字眼来阻挠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和发展，其险恶用心何其毒也。

五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重申党的民族政策，明确指出：“认真办好民族院校，重视使用和发展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因此，我们要理直气壮地彻底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影响，认真落实党的民族语文政策，振兴民族教育，以保证民族语文的使用和发展。然而，如果从这里得出结论，可以提倡对兄弟民族文化和语言的排他性，那就大错特错了。振兴民族教育，使用和发展民族语文，这并不意味着提倡独树一帜并在本民族狭隘范围内闭关自守的方法来巩固民族壁垒。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深入发展，广大少数民族人民群众不单要学好本民族语文，而且还迫切要求学习和掌握我国使用人口最多的汉语文。满足这种要求和愿望，是有利于我国各民族之间相互交往和友爱合作，进而有利于发展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因此它毫无疑问是民族教

育所义不容辞的。

四

举办民族学校，是不是列宁早就批判过、崩得分子所主张的“按民族分校”？这是在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影响，振兴民族教育的过程中，急需加以澄清的重大理论是非问题。猖獗于十年动乱时期的“三段论”主张；列宁早就批判崩得分子的“按民族分校”的口号是反动的；而举办民族学校也是要求“按民族分校”的；所以，举办民族学校是崩得分子“按民族分校”的翻版，是反动的。如此极“左”的“三段论”，迫使我州大批的民族学校被停办或拆散，取而代之的是被称为“符合民族融合大方向”的“民族联校”（即民、汉合校）。打倒了“四人帮”，结束了民族教育灾难深重的厄运，曾被拆散的民族学校正在陆续得到恢复。然而，至今有些民族教育工作者仍受这个“三段论”精神束缚，不能为振兴民族教育而理直气壮地工作着。

只要稍加回顾历史，我们就不难发现：“三段论”选用“按民族分校”这样的中词来连接大、小前提，从而得出“举办民族学校是反动的”结论，是别有用心的。为了澄清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看看列宁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怎样批判崩得分子所极力鼓吹的“按民族分校”这个口号的。早在 1912 年至 1914 年时期的俄罗斯，正值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前的工人运动高涨年代。当时，列宁为了争取和捍卫各民族工人阶级的政治上的大联合，尖锐地批判了崩得分子提出的“民族文化自治”、“按民族分校”的口号。这个口号到底是什么货色呢？列宁对这个口号的主张，曾做过这样的概括：“每一个民族，不管属于它的任何一个人住在什么地方（不分地域：‘超地域的’，非地域的自治这个名称即由此而来），组成一个得到国家承认的联盟，管理民族文化事业，其中主

要的是教育事业，用每个公民自由登记（不分居住地点）的办法来确定民族成分，使他们参加一个民族联盟，这样就可以保证绝对精确和绝对彻底地按民族分校。”简言之，所谓“按民族分校”所主张的，就是把教育事业，“从国家管理中分出来”，并交给“超地域的民族联盟”管理，由它们来各自发展“本民族文化”。列宁在批判这个口号时，尖锐地指出：“既然经济生活把住在一个国家的各个民族结合在一起，那么，企图在‘文化’问题特别是在教育问题方面一劳永逸地把这些民族划分开，岂不是荒谬的和反动的。”之所以是“反动的”，是因为“‘民族文化自治’的口号以民族在文化上统一的幻影来欺骗工人”，“事实上就是把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传播到工人中去”（以上引文，详见《列宁全集》第19卷第536、100、505页）。

在历史上，曾有一些人别有用心地歪曲过列宁对“民族文化自治”、“按民族分校”的批判。对此，列宁本人和斯大林不止一次地予以有力的回击，使得他们的阴谋未能得逞。回顾一下这个历史，对进一步澄清“三段论”所制造的理论是非很有益处。就是在列宁和崩得分子进行论战的当时，有叫安恩的人大耍诡辩术，硬说：“用本民族语言讲课的学校，也就是按民族分校；真理派想取消异族人民的民族学校！”对此，列宁一方面用铁的事实批驳了安恩的所谓“真理派想取消异族人民的民族学校”的诬蔑之词；另一方面，也揭穿了安恩偷换“按民族分校”这个概念的本来内涵，把它解释为“用本民族语言讲课的学校，也就是按民族分校”的卑劣手法。列宁辛辣地讽刺安恩，说他“由于无能的愤怒而开始丧失理智”。（《列宁全集》第19卷第553页）

对列宁的歪曲并没有就此完结。1930年左右，戴上国际主义的假面具并以列宁的名字做掩饰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倾向分子，曾蛊惑人心地提出：“列宁在1913年，同崩得分子争论时说

过，民族文化的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口号，——由此不是应当得出结论说，现在已经是消灭苏联各族人民的民族文化来维护……国际主义的时候了吗？”这种说法，理所当然地被斯大林批驳得体无完肤，斯大林指出：“列宁从来没有说过，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发展民族文化的口号是反动的口号，恰恰相反，列宁向来主张帮助苏联各族人民发展本民族的文化。”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斯大林援引了党的十大在列宁的领导下拟定并通过的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指出：“在他们那里发展使用本民族语言的报刊、学校、剧院、文娱事业以及一般文化教育机关”，“广泛地建立和发展使用本民族语言的普通教育性质和职业技术性质的训练班网和学校网。”（以上引文，详见《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316页—317页。）

既如上述，“三段论”对列宁的歪曲也就太明显不过了。列宁对“民族文化自治”、“按民族分校”的批判，不可能、也不应该成为摧残民族教育的“理论根据”；我们党关于扶助和发展民族教育的政策，正是以马列主义的民族学说为理论根据的。总之，我们要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民族问题的学说，彻底清算“四人帮”的种种谬论邪说，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尽快地把民族教育振兴起来，发展下去，使之为极大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为实现我国四个现代化而做出应有的贡献。

（本文为准备起草州文教办党的核心小组报给中共延边州委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教育工作的请示报告》而写；该《请示报告》于1977年10月行文，后于1977年12月经州委批转各地执行，为民族教育方面的拨乱反正工作指明了方向。）

汉语教学与民族教育

(1979年6月)

如何认识汉语课教学在民族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既是个老问题，又是个新问题。就其道理而言，这似乎是早已解决了的老问题；但就其实践而论，这又是急需认真加以解决的新问题。据州汉语课教学调查组反映，有不少学校严重地放松了汉语教学管理。究其原因，有两种错误认识作怪。有些同志认为：现在是民族教育的振兴时期，可以而且应该降低汉语教学的地位和作用。还有些同志则认为：高考可以用本民族语文答卷了，现在可以让汉语教学靠边站。这两种错误认识，是重视汉语教学管理，提高汉语教学质量的两大思想障碍。这不能不说是我们新的历史时期遇到的新问题、新矛盾。对此，我想谈谈几点看法，其中主要涉及汉语科教学在整个民族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问题。

一、揭批林彪、“四人帮”破坏民族教育的罪行，绝不可把汉语教学排斥在民族教育之外。我州的民族教育正处在振兴时期，这是客观事实。我们是要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破坏民族教育的种种罪行，努力繁荣和发展民族教育的。然而，绝不可矫枉过正，把汉语教学排斥在民族教育之外。我们的民族教育不能在本民族的狭隘范畴内闭关自守，绝不能赞赏对主体民族文化和语言的排他性。不仅不能赞赏，而且还应特别加以警惕。这是因为，正如列宁所说，教育领域是“社会生活中可以说是最有思想性的领域”，是“使‘纯粹’民族文化最容易存在，或使教权主义和沙文

主义最容易在民族基础上发育滋长的领域”。

二、汉语教学是民族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绝不可忽视汉语教学对民族教育之发展所起的重大作用。国家教育部颁布试行的《工作条例》规定：“使用少数民族语文教学的学校，要使学生学好本民族语文和汉语文。”请不要误会这是人为的规定。列宁说得好：“经济流通的需要往往会使居住在一个国家内的民族学习大多数的语言。这不是人为规定的，是客观规律，因为语言是手段，是工具。人们利用它来彼此交际，交流思想，达到互相了解。”汉语教学成为民族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这种客观规律的反映。

从实际来说，我们不能不正视汉语在我国多民族生活和发展中的如下作用：在像中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里，汉语是各民族间相互联系和交际的工具，是促进他们的经济和文化进一步发展的工具；掌握汉语，能促进科学技术领域里民族干部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学好汉语是保证国内各民族的所有公民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中顺利地服兵役的一个必不可缺的条件，等等。

我州民族教育的历史也证明，不把汉语教学质量搞上去，整个民族教育质量的提高也受很大影响。我州民族教育的普及程度早在五十年代闻名于全国，但是其质量的提高程度却不能令人满意。我们应当实事求是地承认，其中一条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与我们的汉语教学质量不高有关。这就从反面说明一个道理，就是：在一定意义上说，把我州民族教育质量搞上去的关键在于千方百计提高汉语教学质量。

三、民族教育必须反映广大朝鲜族人民群众学好汉语的迫切要求。现在，在我州广大朝鲜族人民群众中，蕴藏着势不可挡的“汉语热”。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深入发展，尤其是伴随着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汉语热”在我州广大朝鲜族人民群众